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1.02.001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回顾、逻辑与前瞻

顾书桂

(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要:中国共产党五代集体领导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个探索和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带来的经济活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存在明显的规律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爆发,中国经济要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亟需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项全会决议已经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

关键词: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1)02-0005-08

经济发展战略是估量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目标、解决重点问题、经过主要阶段,以及为此采取的重大部署、政策与措施等^[1]。党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经济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均体现在历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与决议中。以此为线索,回顾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历程,有利于我们科学分析其演变逻辑,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

一、中国共产党五代领导集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考苏联模式进行经济建设,但由于中苏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现实,因此建国后头三年(1950—1952),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企业改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财经工作,完成新解放区土改,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内就迅速完成(比中共中央预计提早十年),另一方面由于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揭露了苏联模式的局限性,中共中央亟需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回应。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堪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探索^[2]。“一五”计划的执行暴露出中国农业发展的局限性^②,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二五”计划(1958—1962)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衡,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③。党的十大开始,国民经济失衡的局面有所扭转^④。党的

收稿日期:2020-10-30

作者简介:顾书桂(1970—),男,江苏姜堰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金融学、城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十一大虽然没有涉及经济建设,但推翻了极左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日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打下了基础^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战略根本转变的标志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⑥,为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吹响了冲锋号。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⑦,农业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首次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列,并且物质文明建设居于前列。会议确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⑧。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首次完整表述。随着农村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力迸发,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⑨,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的指南与灵魂,其影响一直延伸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1987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会议还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⑩。十三大报告不仅单列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而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由于改革开放的经验不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冒进引发了1988年较为严重的全国性物价上涨,反过来激化了收入分配矛盾^⑪,这迫使中国经济再一次治理整顿,传统计划力量大大增强^⑫,然而,1990年的中国经济停滞证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已经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前进的大方向^⑬,它不因任何一时的挫折与失误而动摇或夭折。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终成型,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主要贡献是凝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应地,党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⑭。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它是此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我国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初步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将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确定为20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⑯。党的十五大再次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与政治法制文化建设并列,反映经济建设再次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并且成为中国政治、法治和文化建设的基础。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

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为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业和国企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和难点。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⑧,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

2003年10月14日,为了落实十六大会议精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主要涉及城市经济、农村农业、市场和政府建设等内容。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继承和发展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主要思想,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有力地确保了中国经济发展2010年战略目标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⑨。在此基础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即“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经济发展构成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经济发展战略侧重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党的十七大将民生保障纳入社会建设并单列,说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解决农村的发展滞后问题,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继承和发展了1998年10月14日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其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⑩。党的十八大将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单列为生态建设,说明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2013年11月12日,为进一步挖掘经济活力,更好地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目标是“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中国过去多年改革开放政策和经验的一次系统总结与发展,目的是为了全面激发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活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建设小康社会。经过五年的探索总结,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八个“明确”。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九大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即“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⑨。为了全面完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如果说2013年的决定基本上侧重于经济,2019年的决定已经将非经济包括政治、文化、外交、社会生活、党的建设等作为改革的重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事件。

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内在逻辑

纵观中国共产党五代领导集体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发现其存在明显的规律性。

(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起点很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一方面由于苏联模式缺点的暴露,另一方面由于中苏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如何在中国科学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而且,经济建设与政治运动、军事战争不同,它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过程,需要足够的量变才会引起质变,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导致中国经济建设过程布满崎岖。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在“三五”计划前的1964年12月份就提出,但直到1987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党的十三大才确定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应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1990年解决温饱,2000年基本实现小康,2010年实现富裕小康,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中国经济发展的低起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低起点,它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必须反映中国经济自身的运动规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纵向特征远远强于横向特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承前启后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个指导思想贯穿始终的,这在改革开放前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但在执行过程中政治需要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党的八大既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也阐述了政治建设、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并且经济在前,处于基础地位。而党的九大基本上摒弃了经济建设。党的十大虽然重拾经济建设,但无论是内容还是篇幅均处于明显的次要地位。党的十一大继续延续政治挂帅的传统,避谈经济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承前启后性明显增强。如党的十二大规定,1981—2000年经济建设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全国工农业产值翻两番;党的十三大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实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五大规定,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宽裕小康,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党的十九大规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期间,既经历了领导核心的更替,也经历了经济发展战略执行者的变化,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大目标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大目标的进一步细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改革开放“先经后政”“政经良性互动”指导思想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先进的生产关系如果不能植根于现实的生产力,只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造成国

民经济不断遭受政治干扰,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农村经济改革引领城市经济改革,虽然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开放性探讨引起了人们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特别是苏联东欧巨变使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应延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激发的活力充分利用之前,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保持基本稳定。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即使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停留在完善的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始终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大中型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角,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7个经济方面的专门决定,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有3个,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涉及三农的有3个,即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国有企业的仅有1个,即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考虑到三农影响国家的整体稳定,城市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主角光环可见一斑。

(四)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增加了当前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难度

1978年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与以前相比波动幅度明显缩小,但也经历了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1978—1990年,由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1984年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高潮,但因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受挫,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逐渐衰退;1990—1999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集体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大发展,1992年再次迎来一个增长高峰,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的活力逐渐衰退;1999年至今,加入WTO又给中国带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的契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迎来第三个高峰。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探底时间已经够长,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10%,探底的深度已经低于1999年的7.66%,仅高于1990年的3.92%和1981年的5.12%,中国经济再次腾飞需要一个新的动能,而且这种努力实际上早在2013年就已开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不再拘泥于过去的经济建设,而是扩大到社会、生态、政治、文化建设。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将民生保障独立,将生态建设、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行政体制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军队建设、坚持一国两制、和平外交建设、党和国家监督体制建设等作为主要改革目标。2020—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时间周期划分由10年变为15年,意味着认可了目前的经济中低速增长,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开放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展望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目标,开始向国际标准的现代化目标前进,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不可能再沿用传统的纵向思维,而是必须在国际间进行横向比较,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将遵循一般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路径。

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都是短期现象,因为政府干预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中国首次系统地关注问题、不足和挑战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党的十五大开始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缺点主要是“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活力不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

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发展差距还明显存在,城乡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等等”。2002年,党的十六大继续指出:问题主要是“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困难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2012年,党的十八大继续指出:不足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农业基础均不理想,资源环境约束更大,科学发展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增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科学发展能力弱,基层党组织软弱,少数党员干部缺乏理想信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不高,生态环境保护难;民生领域有短板,脱贫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群众民生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问题;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不够;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中国经济问题也许不止这些,但相关表述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是临时性的,在发展过程中是可以解决的;也有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其解决不可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或者经济体制改革,而必须借助于政治、文化甚至社会改革。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在本世纪中叶前必须解决的。相应地,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合理化。这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每次党代会都关心的重大问题。横向比较,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中比较突出,这不是一个经济现代化国家应有的,更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须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问题^①。1992年以前,中国经济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政策很容易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影响很小的范围内,即有富人,但其拥有的财富规模不大,数量更少。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后,分配主要交给市场,因为部分市场垄断的延续,存在政府官员的寻租现象,如何减少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恐怕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更深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只能依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所以,以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重要内容。收入分配合理化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社会保障的成本也会大大下降,有利于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真正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

2. 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虽然党的十六大没有提及城乡差别,城乡一体化却是最近三代领导集体核心都关心的老话题。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城乡一体化发展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但在中国房地产畸形扩张的影响下,中国数亿农民进城工作却无法进城生活,形成前所未有的农民工大潮。一方面,城市二三产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第一产业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全面更新,现代农业起步艰难。如何破解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的绑架,还是需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或经济发展,因为

中国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在普通住宅的高房价,在于规模庞大的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让金,这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根源,也是中国城乡割裂发展、农业难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当然,党的十九大后,通过三权分置,农业现代化、农业经营规模化已经开始起步,但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维护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以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农民进城,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促进城乡各自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迅速发展,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3. 区域开发与发展战略。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分布有很大的地区差别,这是中国收入分配存在较大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如果能根据资源开发需要、环境承载能力合理引导人口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收入分配地区差距。地区发展间的差距,其解决不仅需要人力,更需要物力财力,应该在国力允许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举。解决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依赖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发展的地区差距依赖综合国力的增强,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因此都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重要内容。

4. 社会保障与扶贫。一个人、一个家庭脱贫与否,不仅取决于其工作能力,更取决于其工作环境。中国原有的贫困人口中,很多人不是没有工作能力,而是无法离开居住区寻求工作机会,在人口迁移成本大幅降低的前提下,扶贫本质上就成为社会保障的内容。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下滑,从而影响就业;教育本来是培养优质劳动力的,大学生就业难反映我国的教育与生产力发展并不完全匹配;医疗问题一方面体现为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体现为以药养医等现象,其背后折射出医疗资源垄断。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政府需要提高运行效率,机构要精简,人员素质要提高,功能要强化,决策要科学,社会保障职能履行是否到位是检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最有效手段。

5. 科技创新与技术更新。恩格斯说,社会上一旦有需要,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会缺乏人才,也不会缺乏科技进步,缺乏的只是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的环境。我们需要了解科技创新的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革新市场和政策,加快改善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环境,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与科技创新相比,技术更新要简单得多,特别是在技术可以通过引进的情况下。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了,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自然会提高,经济结构也会变得合理。当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要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避免国内企业过度竞争。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创新与技术更新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重要内容。

6.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虽低于发达国家,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远远没有充分挖掘,经济增长完全依靠自己的科技创新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中国应该加大自己的政治、文化、社会改革力度,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努力解决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体经济萎缩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对此党和政府必须大力进行经济特别是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理顺中国经济和分配秩序,不仅要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更要注意产业实体化。中国远远没有到产业空心化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的实体产业外迁意味着未来经济的衰落,所以必须将产业实体化的成本真正降下来。可见,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甚至是恢复中高速增长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长期课题。

四、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五代集体领导核心。受传统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经过探索,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统一,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覆盖政治、社会和文化领

域。过去四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基本内容,这意味着,满足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需要的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体制势必会与中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摩擦。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先经后政”特点明显,它保证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保持相对稳定。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爆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将更多地与政治、文化、社会改革结合在一起,这是对未来中国领导层的重大考验,也是中国在小康社会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社会必须要经历的阶段。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登上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奇迹将向世人展现更加耀眼的光芒。

注 释:

- ① 参见198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及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② 参见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③ 参见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④ 参见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⑤ 参见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⑥ 参见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 ⑦ 参见1979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
- ⑧ 参见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⑨ 参见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其审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⑩ 参见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⑪ 参见198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 ⑫ 参见198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及其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 ⑬ 参见199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公报及其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 ⑭ 参见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 ⑮ 参见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其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⑯ 参见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 ⑰ 参见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⑱ 参见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⑲ 参见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 ⑳ 参见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其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㉑ 参见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 [1] 刘国光.刘国光自选集[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93.
- [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N].人民日报,1976-12-26.
- [3] 顾书桂.论“中国奇迹”的经济转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2):40-52.

(责任编辑:颜 莉)